

勒高夫与“长中世纪”

刘寅

勒高夫的作品常常会给读者带来这样的感受：中世纪离我们现在的世界似乎既很近又很远。站在年鉴学派的经典立场上，勒高夫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把握时间和变化，而长时段的优势正在于能够将历史演进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相结合。这正是他选择使用“长中世纪”（5—18 世纪）的概念来囊括传统意义上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背后的考量。

法国中世纪史学者雅克·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大概是作品的中文译介最多的西方当代史家之一。根据我的统计，他的专著和编著中译至今已有 12 本之多。这种“勒高夫热”自然部分得益于其身为“年鉴学派”当代领军人物与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的“新史学”运动领袖的赫赫声名。但同样重要的是，勒高夫从来都乐于保持一种平易近人的学术写作姿态，这使中世纪研究之外的学者乃至非史学专业的普通读者都有兴趣阅读他的作品，而且不难从中获益。新近翻译出版的《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杨嘉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以下简称《分期》）让中国读者再次得以领略勒高夫轻快的文风，以及他在学术生涯的最后时光里依旧充沛的学术活力。这本小书的法语原版（*Faut-il vraiment découper l'histoire en tranche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出版于 2014 年 1 月，当时的勒高夫已是 90 岁高龄。3 个月后，这位 20 世纪史学大家与世长辞。《分期》一书是勒高夫为我们留下的最后的史学思考。

囊括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长中世纪”

这部散论 (essai) 的主题是



法国中世纪史学者雅克·勒高夫

西方历史中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在勒高夫看来，这两个在传统叙事中泾渭分明的时代，更应该在同一个西方历史的大时段中加以理解，他称之为“长中世纪” (long moyen âge)。勒高夫选择从“历史分期”这个大问题入手思考。中国读者对历史分期问题不会感到陌生。在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史学走向形成的过程中，古史分期问题一度扮演了核心角色。共和国“十七年”史学的“五朵金花”中，分期问题居首，而且与另外两朵金花（“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密切相关。比照中西分期问题可以发现，聚讼最多的都是对上古与现代之间的中间时段的性质与边界的理解：对中国史来说，是所谓的“封建时

代”；对西洋史来说，则是“中世纪”。这不是偶然的。正如勒高夫所言：“新时期的一种观念总是反对前一时期的观念，后者总被认为是黑暗的阶段并理应让位于光明。”（《分期》，第 34 页）与常常被理想化的古典时代不同，中世纪构成了与“现代”相反相成的历史阴影与历史“他者”。勒高夫在《分期》中多次暗示我们，把文艺复兴视为现代的开端与把中世纪视为现代的对立，是伴随着现代西方的诞生而出现的同一种历史叙事的两面。《分期》一书本质上是勒高夫对这种经典历史阐释法的学术史批判。在对于这种西方历史的传统分期的形成史与修正史的辨析中，勒高夫阐发了他对“作为社会科学的史学研究”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这也是著名的《年鉴》期刊

1994 年更名之后的副标题) 的性质与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的历史进程的个人见解。

《分期》正文部分共分八章。第一章提纲挈领地概述了三种在前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历史分期方式。它们均具有十分强烈的基督教色彩。首先是以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的四兽异象为原型的统治帝国更替模式。第二种是以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九卷为代表的、围绕着圣经历史建构并比照人生阶段的人类历史六时期模式。第三种分期模式以人类的救赎历史为主线，勒高夫以 13 世纪圣徒传集《黄金传说》为其代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于 2016 年的该作品中译本的译名为《金色传奇》）。在其中，亚当以来的人类历史被分割为“迷途”、“更新”、“和解”与“朝圣”四段。第二章

梳理现代历史分期模式的发生史。彼得拉克在 14 世纪最先使用了区别于古代和当下的“中间时代”一词。德国新教史学家塞拉里乌斯在 17 世纪第一次用“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分法写作通史，以“中世纪”为主题的一卷以君士坦丁皇帝始，以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终。直到 18 世纪末，“中世纪”都是一个与黑暗和蒙昧相关的负面概念。19 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与中世纪文献学的兴起开始为“中世纪”洗刷污名。第三章从教学和学科建制的角度继续讨论现代史学。通过罗列欧洲各国大学中史学讲席的设置时间等方式，勒高夫勾勒了历史如何在 16—19 世纪期间逐步演化为自主的教育和研究对象。

第四、五章的主题是文艺复兴的学术史。勒高夫先是探讨了两位 19 世纪的史学家对作为一个独立历史时期的“文艺复兴”的“发明”。一位是勒高夫所钟爱的法国史家儒勒·米什莱（可进一步参考勒高夫的论文《米什莱的几个中世纪》，收录于《试谈另一个中世纪》，周莽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另一位是德语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米什莱在 1840—1841 年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中开创性地

（下转 4 版）➡

➡（上接 2 版）

最能够体现斯塔罗斯金才华的，是 1989 年出版的关于古汉语音系构拟的巨著。他的这部书备受关注，得到中国语言学家郑尚芳和美国学者白一平 (William Baxter) 等的高度评价。仅在国内，已经先后出版了两种中文译本（《古代汉语音系的构拟》，林海鹰、王冲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古汉语音系的构拟》，张兴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而该书俄文原著的审定者，正是雅洪托夫！事实上，雅洪托夫是他从事语言研究的启蒙导师。

2016 年，为庆祝雅洪托夫 90 寿辰，圣彼得堡出版了题为

《汉语和普通语言学问题》的论文集（共 656 页），收列了雅氏自 1952 年至 2009 年较为完备的著作目录。该书正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雅氏本人一些重要论文的辑录（共 29 篇），第二部分是各国学者撰写的、范围广泛的论文 14 篇（如美国学者白桂思对《后汉书》所载《白狼歌》的最新研究等）。非常可惜的是，书只印了 150 册，很难看到，不过书中的若干内容，现已可通过网络获得。

尽管拥有巨大的学术成就，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雅洪托夫终身未获教授职称。其中原因，据说是因为按照规定，学者获得学位后，必须提交至少一部比较厚重的学术专著，才



俄罗斯语言学家斯塔罗斯金 (1953—2005)

能取得评定教授资格。雅洪托夫一生的论著约一百数十种，若按其质量来说，他完全称得上是“教授的教授”，但由于

其论文言简意赅，篇幅较短，甚至已出版的专著亦并非“长篇巨制”，以至于与“教授”的头衔失之交臂。但他一生以从事教学和科研为最大的乐趣，临终在睡眠中安详离世。正由于这种追求真理而不计名利的品格，使世界各国学者对他倍感怀念。

最后，笔者想引用陈寅恪先生悼念王国维先生的名言来评价雅洪托夫一生的学术业绩：“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李纯一 licy@whb.cn
刘力源 liul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汇报学人

